

# 唐宋档案文献 编纂研究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in Tang and Song

李晓菊/著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唐宋档案文献  
编纂研究



---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in Tang and Song

李晓菊/著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档案文献编纂研究 / 李晓菊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5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5892 - 2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档案文献 - 编辑工作 - 研究 - 中国 - 唐宋时期 IV. ①G27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7168 号

·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唐宋档案文献编纂研究

著 者 / 李晓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张倩鄂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892 - 2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2.25

字 数 / 37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  
专项经费资助

## 总 序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成果。

汉唐两朝，以其大一统的格局、强盛的国力、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应时而变的制度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汉到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由奠基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影响至深。唐代是中国中古历史的转型期，唐以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许多与此前不同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新的源流。汉和唐作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的盛世，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自宋以来，一直到清朝，就多有学者将汉唐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命题。但在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断代分割的趋势，即秦汉史和隋唐史被分割成两个断代，而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放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提出问题。局限在传世史料中按朝代分别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但也使汉唐时期历史研究的问题空间在萎缩。近年来，由于新史料的出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汉唐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学术转机。如汉魏简牍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出土，汉唐间各种石刻史料和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和整理刊布，都为汉唐制度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外，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片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和对话的需求，对以汉唐为中心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有重视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办学理念 and 优良传统。历史学院自2004年成立汉唐研究中心以来，围绕“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整齐的研究队伍。列入“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的，主要是本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涉及汉唐

间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方面的论题，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刘后滨）、《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研究》（孟宪实）、《秦汉法律文化研究》（孙家洲主编）、《秦汉统一战略研究》（黄朴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李小树）、《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孙家洲、刘后滨主编）、《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李全德）、《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韩树峰）等著作。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推动下启动的。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尤其是以汉唐研究中心为依托的相关课题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教授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研究以极大的鼓励。汉唐研究中心顾问田余庆、沙知、吴宗国等著名学者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深表感谢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汉唐研究中心

2012年3月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b> .....	1
一 历史的回溯 .....	1
二 研究意义与价值 .....	7
三 既有研究成果简述 .....	10
四 研究对象与内容 .....	15
五 基本线索与本书结构 .....	21
<b>第二章 唐宋社会与档案文献编纂</b> .....	29
一 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 .....	29
二 经世致用之学显著发展 .....	40
三 去骈就散、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 .....	44
<b>第三章 官方档案文献编纂之机构与制度</b> .....	46
一 史馆 .....	46
二 起居院、日历所与实录院 .....	58
三 会要所和玉牒所 .....	67

<b>第四章 官方档案文献编纂之基本类别</b> .....	72
一 国史档案文献 .....	72
二 行政档案文献 .....	110
<b>第五章 私家档案文献编纂——唐</b> .....	153
一 起居注 .....	155
二 谱牒 .....	161
三 诏令集 .....	163
四 奏议集 .....	171
五 官署志 .....	181
六 登科记 .....	189
七 刘知幾档案文献编纂理论 .....	192
<b>第六章 私家档案文献编纂——宋（上）</b> .....	208
一 外交档案 .....	208
二 诉讼档案 .....	213
三 官署志 .....	215
四 登科记 .....	220
五 会要 .....	224
六 诏令集 .....	230
七 奏议集 .....	254
<b>第七章 私家档案文献编纂——宋（下）</b> .....	276
一 金石档案文献 .....	276
二 人物档案文献 .....	289
<b>结 语</b> .....	311



参考文献 .....	318
一 古籍文献 .....	318
二 研究成果 .....	323
索 引 .....	335
后 记 .....	340



# Contents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1**

1. A Brief Survey on Archives Compilation before Tang / 1
2.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Study / 7
3. Literature Review / 10
4. Subjects in the Study and Content / 15
5. Major Points and Structure of this Book / 21

## **Chapter Two Th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and Social Background in Tang and Song / 29**

1. The Strengthening of Autocratic Monarchy / 29
2.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Practical Historiography / 40
3. The Rising of Chinese Prose Movement; Prose Replacing Parallel Prose,  
and the Promotion of Writing as a Way to Convey the Way / 44

## **Chapter Three Offices and Institutions of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 46**

1.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 46

2. The Offices of Court Diaries, Calendars, and Veritable Records / 58
3. The Office of Imperial Documents and the Office of Imperial Genealogy / 67

#### **Chapter Four The Basic Types of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 72**

1.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Archives / 72
2. The Archives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 110

#### **Chapter Five The Privat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 Tang / 153**

1. Court Diaries / 155
2. Records of Genealogy / 161
3. Collected Edicts / 163
4. Collected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 171
5. The Records of Government Offices / 181
6. Lists of Successful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 189
7. Liu Zhiji's Theory of Archival Documents Compilation / 192

#### **Chapter Six The Private Compil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 Song (part I) / 208**

1. The Archives of Foreign Affairs / 208
2. The Archives of Legal Affairs / 213
3. The Records of Government Offices / 215
4. Lists of Successful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 220
5. Imperial Documents / 224
6. Collected Edicts / 230
7. Collected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 254

# 第一章 绪论

现代学科体系中，学科史是学科独立不可缺少的史学支撑点。每一个学科在其成立和发展过程中，都必然把自身的发生发展、源流演变研究，作为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研究，是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课题，它的任务在于根据现代档案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方面以及各种形态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在相关原始文献的深入挖掘与整理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总结，从而丰富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知识和理论，推进学科的发展。唐宋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在全部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从档案学、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唐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是深化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史整体研究的可取途径。

## 一 历史的回溯

中国古代档案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档案文献，而且在长期的编纂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尽管由于所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不同，中国古代档案文献在外部形式和具体内容上呈现不同的时代乃至地域特征，但其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与相互影响。因此，在考察唐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唐以前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做简要的回溯。

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悠久，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档案文献汇编，《尚书》中保存了上古虞、夏、商、周时期重要的政府文告、战争誓辞、名臣论政以及大事记等文字记录，

其中具有后世诏令奏议性质的君诰、臣对，构成《尚书》的主体内容。<sup>①</sup> 这些政府文书和文字记录的形成、保管与流传，与先秦时期的史官和史官制度密切相关。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负责记事和文书档案制作与保管的官员。卜辞中多用“史”指史官，<sup>②</sup> 即指那些能够使用文字记录事情、制作典册、辅助王政、传布知识的人，如“作册”和“大史”。《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sup>③</sup> 是殷先人曾将汤伐夏桀之事记录在典册。《周礼·春官·内史》：“内史掌书王命”，<sup>④</sup> 当是承自殷代的“作册”。殷代“作册”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即掌管图法，《吕氏春秋·先识》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sup>⑤</sup> 卜辞中的“大史”，与“作册”同为史官，但地位稍逊，尽管如此，“大史”在王朝祭祀、占卜和记录时日中，仍具有重要的作用。<sup>⑥</sup> 据研究，商代“作册”之官已有官长及僚属机构。<sup>⑦</sup> 现代甲骨学家所称的“贞人”（甲骨文中称“多卜”），<sup>⑧</sup> 则是专门辅助殷王从事占卜活动的官员，负责除

①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将现存《尚书》（今、古文均包括在内，下面加点篇目系经学界考定为伪古文者）划分为五个方面：（1）国家大事纪略（《尧典》、《舜典》、《大禹谟》、《汤誓》、《汤诰》、《秦誓》上中下、《牧誓》、《武城》等）；（2）战争讨伐宣言（《甘誓》、《胤征》、《费誓》、《秦誓》等）；（3）政府重要文告（《盘庚》上中下、《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蔡仲之命》、《多士》、《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冏命》、《吕刑》、《文侯之命》等）；（4）名臣宏文伟论（《皋陶谟》、《益稷》、《五子之歌》、《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旅獒》、《无逸》等）；（5）其他重要著述（《禹贡》、《洪范》等）。参该书《尚书评述》部分，东方出版社，1996，第58~59页。

② 据考证，卜辞中“史”应是使节之本字，其见于殷代金文中的原始字形象“手持旌旄为信”。史字从口，应属后加的成分，表示用口说话，盖古宣王命之意。卜辞亦多用“史”指史官，则已非用字之本义而为借用之义。参刘桓《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第1~2页。

③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03页。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835页。

⑤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第945页。

⑥ 刘桓：《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第1~6页。

⑦ 白钢主编，王宇信、杨升南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先秦），人民出版社，1996，第233页。

⑧ 白钢主编，王宇信、杨升南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先秦），人民出版社，1996，第232页。

吉凶判断以外几乎所有的事务性工作，是卜辞文书档案的制作者和管理者。在一些被称为“非卜辞记事”的甲骨刻辞中，就有关于甲骨的来源、数量，经某人检视等记事文字，有的还注明日期干支，或有史官签名，<sup>①</sup> 这些都应是殷代史官留下的卜辞文书档案制作与管理的工作记录。殷代史官既掌管文书制作与保管，又担负记事之职，实为后世史官的前身，早期史官所具有的这种档、史之职兼于一身的特点，在后世制度中仍可以看到。

周代史官较之殷代分工更为细密。《周礼·春官》载有“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根据学者对《周礼》及铭文文献有关记载的考察，“五史”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主要职能均与文书记事有关；周代还有守藏室之史，专门负责王朝的藏书，以其“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又称“柱下史”。<sup>②</sup> 自周公辅政，西周一统天下，天子王命威严，书记制度发生变化。记言之史日显重要，记言记事相分，史官之职亦有了分工，周官“五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五史”中，大史及属下小史，构成记事、记动的系统；内史、外史则以记言为主，形成记言系统。至晚在战国中期，史职又有左、右之称，此为后代左、右史分记言、动制度的源头。<sup>③</sup>

西汉时期，随着中央政治制度的发展，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文书档案保藏机构，即御史府兰台。汉代御史大夫由皇帝亲信御史发展而来，虽位居副丞相，但与皇帝关系近密，独立开府办公。御史大夫既掌皇帝的文书记事，进而掌管国家图书秘籍和四方文书，此为兰台所以设置之由。《汉书》载：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核按章。”<sup>④</sup> 可见，“掌兰台秘书”，为御史中丞的主要职能之一。<sup>⑤</sup> 到东汉明帝时期，兰台由专门的国家重要图书档案收藏机构，演变为国史著述机构，并陆续编撰了国史《汉记》（后人称《东观汉记》）；兰台令史，由掌兰台秘书进

①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39～143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索隐”，中华书局，1982，第2675页。按：“外史”，只见于《周礼》、《左传》，不见于金文材料；“御史”，《周礼》的说法与铭文并不一致，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详。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9～13页；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58～60页。

③ 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4～15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第725页。

⑤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12《职官下》，中华书局，1962，第290页。

而校理图籍，修撰汉史。《史通·史官建置》载：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sup>①</sup>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sup>②</sup>

据学者研究，西汉自武帝时，承先秦太史余绪复置太史，既掌星历，又掌记事，天官、史官合一。东汉初年以后，史官（即太史）已完全变成天官，<sup>③</sup>所谓“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sup>④</sup>兰台令史，是东汉较早设置的史官，职司图籍校理、国史修撰，不预天时、星历之事，独立于天官之外，因而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专门史官。天官、史官相分，是汉代史官制度的重要变化，专门史官的出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sup>⑤</sup>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看到史官、天官的分道扬镳，也可以看到文档官员与记事之史结合的轨迹。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以后，皇帝诏集朝中有才学的散官著作于东观，东观成为官修史书的场所，官修国史步入经常、持续性轨道，为此后史官组织制度和国史著作制度的形成做了准备。<sup>⑥</sup>

东观有著作之事，但未置著作之官。到魏明帝时，始设著作郎。《晋书》卷24《职官志》载：“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sup>⑦</sup>曹魏“著作郎”之设，是历史上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著作郎日常工作是集注皇帝言行起居。《通典》载：“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郎掌之。”<sup>⑧</sup>大概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又设立了专门的著述机构，称著作局。《晋书》载：“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省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

① 《后汉书》卷48《杨终传》载：“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显宗（按：明帝）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中华书局，1965，第1597、1599页。

② （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10页。

③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39、40页。

④ 《史通通释》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07页。

⑤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42页。

⑥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42页。

⑦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735页。

⑧ （唐）杜佑：《通典》卷21《职官三》，岳麓书社，1995，第294页。

局不废。”<sup>①</sup> 惠帝永平元年（291），复置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掌中外三阁图书”。<sup>②</sup> 元康二年（292），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sup>③</sup> 于是著作局改隶秘书，<sup>④</sup> 东晋沿置。著作局改隶秘书，当是出于国史修撰便于利用国家所藏图籍档案的考虑。西晋武帝时，还曾下诏整顿中书记事制度。《晋书》载：泰始六年（270）七月，武帝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sup>⑤</sup> 这项制度使著作郎集注起居有所依据，后著作郎陆机撰有《惠帝起居注》。西晋著作局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专门修史机构，到了东晋，史官的选拔、编制与职责分工等，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既掌集注起居，又掌国史修撰。<sup>⑥</sup>

北魏时期，为适应其统治需要，在继承前代著作制度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起居注制度和国史监修制度。《史通·史官建置》载：“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sup>⑦</sup> 又称“著作省”。<sup>⑧</sup> 北魏起居注官的设置是在孝文帝时期。《魏书》载：太和十五年（491）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sup>⑨</sup> 左、右史即起居令史，后又在起居令史之外，别置“修起居注”。《史通》载：“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sup>⑩</sup> 孝明帝时（516～528），北魏进一步加强对起居注修撰的控制，设置“监起居注”、“典起居注”等起居注监典官。北魏还确立了国史监修制度。神䴥二年（429）、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两次诏集

① 《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735页。

②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10载：“惠帝永平元年（291）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掌中外三阁图书。’”中华书局，1992，第296页。

③ 《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735页。

④ 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01～102页。

⑤ 《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第60页。

⑥ 《史通》卷11《史官建置》载：“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20页。

⑦ 《史通通释》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15页。按：北魏官方修史机构著作局的设置年代，史无明文，牛润珍认为当在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以后，献文帝拓跋弘皇兴五年（471）之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68页。

⑧ 《通典》卷26《职官八》：“后魏著作省置校书郎”。岳麓书社，1995，第383页。

⑨ （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第167页。

⑩ 《史通通释》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20页。



朝士撰述国书，命崔浩总领史任，开国史监修之先河。此后，高允、李彪、崔光、崔鸿先后典领国史，逐渐形成制度，这些都为后来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所沿袭。<sup>①</sup>

北周时，于春官府设外史，与著作官分掌起居注和国史修撰。《唐六典》卷8《门下省》“起居郎”条载：“后周春官府置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以为国志，即其任也。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盖起居、著作自此分也。”<sup>②</sup> 隋炀帝时，“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sup>③</sup> 隋置起居舍人，意义深远，它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设专职掌注起居，进一步完善了古代的记注制度。这项记注官制度为国史修撰建立了一套官方史料系统，为唐宋所继承，一直延续到明清，对唐以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sup>④</sup>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可以获得如下认识：第一，中国古代自先秦时代起，就已经有了职掌文字记录与文书保管的官员，他们是后来历代文档官员与史官的前身。由于自三代以来，中国史官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君举必书”以及左、右史分记言、动传统的形成，大量君王诰命、誓词等“王言”文献得以保存、流传。春秋末年，周室衰微，政治动荡，这些原藏官府被称为“书”的“记言”文献流散损失，经孔子搜求、整理，删定为《尚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sup>⑤</sup> 《尚书》的编纂，寄寓了儒家的思想主张。第二，中国古代从汉代开始，既已设立了专门的文书档案保藏机构兰台，由于兰台掌管国家重要的图籍档案，后演变为包括国史撰修在内的著述机构。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以后，皇家“图籍盛于东观”，官修史书的场所由兰台改在东观，说明当时官禁图籍收藏制度有所变化，兰台所藏图籍主要是国家法令文件、帝王诏令和群臣章奏等机密性较强的文书档案，

① 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四章关于北魏史官制度的论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65~174页。

② 《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第248页。

③ 《史通通释》卷11《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20页

④ 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⑤ 《史记》卷47，中华书局，1982，第1938、1935~1936页。